

社会批判理论： 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

■ 仰海峰

【摘要】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一脉相承的哲学理念。这一理论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批判；卢卡奇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物化与主体性为核心的批判理念；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纲领的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基本理论立场。

【关键词】 资本逻辑批判 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1)02-0048-03

社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核心，也是自马克思、经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中介，再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发展的一条核心纽带。虽然在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没有专门去讨论马克思，也没有对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关系做出清晰的说明，有的学者甚至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进行了批评，但如果从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精神，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一视角来看，自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到1970年代以《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的理论逻辑终结这一期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的正是马克思哲学的这一批判精神，并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化和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合乎时代情境的发挥。本文所讨论的，正是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逻辑转变过程，以便从根本主题上把握这一思潮的内在逻辑，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效应。

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逻辑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在其正式出版的著作中，“……批判”往往成为其著作的副标题，从早年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无

不如此。但在讨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时代，有很多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学者，如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等。如果马克思不能将自己的理论与这些理论区分开来，马克思的思想就会淹没在其中。就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而言，重要的分野在于：通过对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马克思意识到，任何哲学都是特定社会历史中的哲学。当德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时，德国的哲学当然不能真正将自己的思想与历史的进程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只能以思想的进程替代历史的进程，这正是青年黑格尔派进行“跪着的造反”的原因。

正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资本是一个不断自我建构和扩张的结构，在这一不断自我结构化的过程中，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工人只是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对资本逻辑的洞察使马克思认识到，对资本家或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种道德评判意义上的批判并从中寻求一种解放的途径，都是不可能的。这正是他批判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这也让我想起当下一些学者的批评，即马克思的哲学中缺少对正义理论与道德的讨论。这一问题需要做出有层次区分的回答。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如果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那么在这个结构之内谈正义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最多只能得出黑格尔式的改良结论,而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正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结构中,新的制度建构会在更高层面解决这一问题。当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资本的逻辑,那么就需要在资本逻辑的框架内,讨论正义问题。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的确没有讨论,因为这不是他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以后的工作只是将这种新哲学运用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按照我现在的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建构的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生产逻辑,但这一逻辑并不能用来批判地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从这一逻辑出发,马克思无法超越李嘉图社会主义。只有进入到资本逻辑,马克思才能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因此,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的[1]。按照这一思路,只有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的思想才真正地达到理论上的高峰。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我认为,资本逻辑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

第二阶段,即卢卡奇、柯尔施等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重申,并将这种批判指向组织化资本主义,这是从马克思向法兰克福学派过渡的中介。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可以被总结如下:首先,他通过哲学批判了宗教;然后,他通过政治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2]卢卡奇同样认为,马克思哲学体现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在他看来,我们可以拒绝马克思的所有结论,但不妨碍我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方法,即历史辩证法或批判的方法。葛兰西的思想虽然直到1960年代后期才开始影响西方世界,但在葛兰西的思想发展中,对经济决定论式的传统思路的批判,强调从主体能动性出发来批判地面对资本主义,这构成了其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新的批判理论无论在历史指向上、还是在内在逻辑建构上,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都有一定的差异。马克思批判的是自由资

本主义社会,这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代。虽然机器生产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广阔的前景,但手工劳动以及传统的一些职业分工,并没有完全消失。同时,这个阶段也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是一个阶级分化明显、剥削非常残酷的时代。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资本逻辑批判揭示的正是这一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自19世纪后期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重要的转型,这就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大工业及机械化生产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模式,资本也日益从过去的分散竞争状态转向集中与垄断,阶级关系也发了变化。正是看到了这些变化,很多学者一方面在继承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精华和方法,另一方面力图从变化了的现实出发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论述,无不体现了这一意图。卢卡奇以物化概念为核心的批判理念,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产生的。

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整合韦伯、席美尔的理论,结合新出现的泰勒制以及流水生产线,提出了物化理论。卢卡奇的批判不仅关注到生产过程中的物化,而且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结构、人们的心理结构及思想观念结构中的物化和二律背反。虽然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出发的,但其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有着重要的差异。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是中性的,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卢卡奇这里,对泰勒制与流水生产线的批判,开启了技术批判的先河。产生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在马克思时代,虽然机器生产已经出现,但还只是体现为一种发展的前景。而在卢卡奇时代,机械化的生产已经成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一生产模式对人的心理与思想的影响也就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福特主义持一种总体上的肯定态度,但他同样意识到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会影响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行方式的变化。这在他关于市民社会与霸权关系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卢卡奇与葛兰西不同,他关注的就是这一生产方式对人的全面的物化。他的物化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精神,同时又超越了马克思的问题域,为法

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提供了思想资源。

第三阶段，即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由霍克海默规划的批判理论以及1940年代以后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

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时，提出了“批判理论”的研究纲领。霍克海默认为，实证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理论产物，与这种思潮相对应的，就是追求超验的形而上学。批判理论对此的批判，就是想继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在这一纲领下，霍克海默强调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以形成从多学科出发来批判当下的社会，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这一思路与卢卡奇、柯尔施开创的思路是接近的。这种跨学科式的研究思路，并形成一种新的批判理论，实际上也是卢卡奇、柯尔施所追求的。在“批判理论”的指导下，当时的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对法西斯主义的心理动机、以及相应的思想观念，展开了多学科的批判分析，形成了一批丰硕的成果。

1934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迁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时，它的“批判理论”主题有了一些改变。当时美国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欧洲国家，尤其是技术在社会生活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而且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文化中。在技术的作用下，人们似乎越来越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而文化工业使人越来越愿意享受这种被操控和支配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也似乎是一个越来越难以被打破的牢笼。针对这一新的现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开始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启蒙，并由此上溯到西方文化的根基处。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已经逆转为支配人的工具理性，造成了一种同质性的社会，人已经完全成为资本的附庸。启蒙本身已经成为新的神话，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奥德修斯与茱莉亚特的讨论，意图就在于此。相比于早期的批判而言，工具理性批判是对西方文明根基的拷问。这种批判在逻辑思路上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但它也存在着内在的难题：如果人已经完全被技术理性所支配，那么何以可能打破这种工具理性的牢笼呢？韦伯的那种悲观主义感叹在这里同样

有了回声。如果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未来提供了一条现实的、可能的解放之路的话，那么经卢卡奇等人的中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时，这种解放的可能性已经渐行渐远了。

大约正是看到了这种理论结局，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返回霍克海默。哈贝马斯重新强调对社会历史生活做一种多学科的研究，相比于前辈忽视实证主义研究的倾向而言，哈贝马斯充分吸收了实证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并在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一种规范性的理论，即交往行动理论。当然，这种返回是有限的。相比于前辈强调的社会批判，哈贝马斯更关注对社会历史的重新阐释。社会批判理论以隐蔽自己的锋芒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西方主流思想中。

从批判理论的这一逻辑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当代产生了深远的效应，它成为很多思想家批判当代西方社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和稳固，在马克思那里可以看到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希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显得越来越遥远。特别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社会从组织化资本主义进入到后组织化资本主义，如何面对新的历史情境建构一种新的批判理论，这成为后来者必须加以探讨的问题。虽然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对此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拉克劳-墨菲在传统理性与主体消解的情境下提倡一种话语链接的实践批判，以便整合各种反抗力量；德里达想通过重申一种面向未来的解放承诺来重构一种非主体的批判精神；还有一些学者想通过一种生态学的批判来探索未来的出路等等，这些研究虽然在哲学的沉思层面很有启发，但这种新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切中西方的社会现实，依然是一个有待考察的问题。

注释

[1]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请参阅拙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1期。

[2]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注释6。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凤翔